

金文读本

凡国栋 编著

凤凰出版社

古文字读本

金文读本

凡国栋 编著

 凤凰出版社

普及类古籍整理图书专项资助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金文读本 / 凡国栋编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506-2602-7

I. ①金… II. ①凡… III. ①金文—基本知识 IV.
①K8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7942号

书 名	金文读本
编 著	凡国栋
策 划	李艳丽
编 辑	樊 昕
责 任 编 辑	樊 昕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bs.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399号,邮编:210038
开 本	652×960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8千字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2602-7
定 价	78.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68037410)

弁 言

汉字乃中华文化之载体,《古文字读本》(四册)则是了解和学习中国古代汉字的入门佳作。该书提纲挈领,深入浅出,最适合初学者循序渐进,步入佳境。读者倘能藉此以为治学之阶梯,便可登堂入室,进而窥探中华文化之堂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值此全书付梓之际,爰缀数语志贺。

丙申孟冬

曹晓通

凡 例

1. 全书文字为简体,必要时使用繁体。
2. 正文包括图版、著录、释文、注释、延伸阅读等部分。
3. 图版,一般甲骨文用拓片,金文用器物照片或拓片,简牍用照片,古玺用印钮照片或印拓。
4. 著录只选一两种主要的文献。
5. 释文格式:假借字用括号标出,重文符号、合文符号直接写出,在注释中说明。
6. 注释从简,有学术定论的直接引用,目前尚未有定论的用“一说”“有人认为”等列出一两条解释。限于本书的性质和篇幅,引用他人成果不一一标明,统一详见最后参考文献。
7. 关于器物的出土、收藏、断代、分域等情况放在注释[1]中说明。
8. 延伸阅读部分力求做到知识性和可读性结合,既有文字学基本知识的融入,也有适当的背景介绍或发散故事。

前 言

金文是铸造或刻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曾被称作钟鼎文、钟鼎款识、吉金文字等。“钟鼎文”得名于钟、鼎在传世各种有铭文的青铜器中的重要地位。所谓“款识”，款是内凹之阴文，识是外凸之阳文。因此“款识”实为铭文的别称。我们知道甲骨文通常为刀刻，故有款无识。钟鼎款识中使用刀刻者必然为款，范铸者也是款多识少。所谓“吉金”亦非取其“吉利”之义，周原出土伯公父簋（《集成》4628）铭文中有“其金孔吉”一语，意思是铸器之铜料非常坚实。因此所谓“吉金”实际上即坚固之金。

中国青铜器铸造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是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是最早见于商文化的二里冈期，早于殷墟甲骨文。不过，那时的铭文多为族氏名、受祭的祖先名或作器者私名，字数仅一二字而已。到商文化的殷墟期，铭文字数逐渐增多，开始出现较长的记事铭文。如本书选录的小臣俞尊 27 字、小子嚳卣 48 字，不过最长的也未超过 50 字。内容涉及到祭祀、赏赐、宴飨、征伐等，是研究商代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西周时期是我国青铜器发展的黄金时代，铸造、器用制度等各方面均达到鼎盛。就铭文来讲，西周中期以后长篇铭文逐渐增多，百字左右的铭文比比皆是，甚至出现了多篇内容宏富的长篇巨制，本书收录的天亡簋 76 字、何尊 122 字、大盂鼎 291 字、史墙盘 284 字。最长的是西周晚期的《毛公鼎》，有 497 字。内容上也亦显得丰富多彩，包括祭祀典礼、颂祖戒后、赏赐册命、征伐记功、训诰臣下、刑典契约等。

周代崇尚宗法制度，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天子诸侯卿士大夫要维护自己在宗族体系中的特权地位，就必须祈求上帝的福佑，托庇于祖先的余荫，因而祭祀神灵先祖就成为铭文中最常见的内容。如本书选录的天亡簋记“王有大礼、王同三方、祀于天室”；叔

矢方鼎记周王在成周的祭祀,先后有“彤”、“大柶”、“棗”等。

铸器刻铭的主要目的之一,乃是“颂扬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礼记·祭统》)。这其中显示和维护家族的特权,提高作器者身份和地位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了训诫后世子孙,有教导向善之意。本书选录的史墙盘是一篇典型的颂祖之文。铭文前半部分颂扬周天子文、武、成、康、昭、穆的文治武功,后半即颂扬微氏家族祖先高祖、乙祖、祖辛、文考乙公的功德。与中山王罍鼎同出的方壶铭文说“昭告后嗣,唯逆生祸、唯顺生福,载之简册,以戒嗣王”,这也点出了铭文的训诫之意。

所谓册命制度,是周王朝为维护统治秩序而采取的一套权力、土地和奴隶的分配办法。所谓“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左传·定公四年》)，“明德”的主体为姬姓贵族。如本书选录的作册矢令方彝记载的周公子明保显然是袭封周公之爵,故称为明公。而周公次子伯禽就封于鲁;同例,克罍铭文记载的周王封召公于燕而就封的则是召公之子克,即铭文所谓“命克侯于匭”。当然也分封了一些非姬姓贵族。如本书选录的疑尊铭文说“纳鄂侯于盩城”,反映的就是非姬姓的鄂侯被改封到盩城的情形。册命的同时伴随着大量的赏赐,有贝、鬯、牛、鹿、鱼、白马、赤金、弓矢、干戈、甲冑、金车、衣旗、土田等等。最怵目惊心的是大量赏赐奴隶和家臣,如大盂鼎赐邦司四伯、人鬲六百五十九夫。

战胜铭功也是长盛不衰的题材。《墨子·鲁问篇》载:“攻其邻国,杀其民人,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本书选录的利簋载武王克商,是中国史上的大事件,匱方鼎载周公东征、中甗载昭王南征也同样脍炙人口。至于反映周王朝征伐淮夷、讨伐玁狁的器物则比比皆是。本书选录的虢季子白盘、兮甲盘、戎簋、不其簋等皆属此类。

诰是周王对臣工发布的训诰和谈话,如《尚书》中的《酒诰》、《康诰》、《文侯之命》。本书选录的何尊所记就是周王迁都成周,在宗庙告诫“宗小子”的话语。再如大盂鼎铭文中关于商王朝隕于“率肆于酒”的那一段训诫,学者多认为与尚书的《酒诰》篇接近。这类铭文的显著特点是有“王若曰”一类字眼,偏重于记言而非叙事。如本书选录的夔公盃没有地点、没有人物、没有事件,以“夔公曰”三字开篇,纯粹是讲道德教训,显然属于此类。趯簋也可能属于此类,整个铭文以“王曰”开篇,不过所诰对象非臣

下,更像是历王在宗庙内对皇天先祖所说的话。

西周后期,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青铜器铭文中关于刑法契约的内容多起来了。《周礼·秋官·司约》云:“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本书所选录的裘卫盃、五年琿生尊即是将当时关于土地交换、财产分割的约剂铸于铜器的产物,类似今天的合同,对于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

西周王朝尊礼尚德。礼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豐方鼎载周公东征归来在宗庙举行饮至礼,盩驹尊反映的是周王在斂地行执驹礼,柞伯簋反映的是西周贵族传习的射礼,此外还有大量的铭文内容涉及到燕飨、聘问、朝见等,都属于周礼的范畴。尚德的观念在金文中更是屡见不鲜。如大孟鼎“秉文王正德”、史墙盘“上帝降懿德大粵”等等。夔公盃中更是将周人尚德的集中反映,短短 99 字铭文中反复提到“德”,如“降民监德”、“厥贵唯德”、“民好明德”、“益□懿德”、“好德”、“唯克用兹德”等。

东周以来,王室衰落,礼崩乐坏,青铜器铭文逐渐式微。楚、秦、晋、齐等诸侯国日益强大,青铜器铭文也开始逐步形成了不同的地域风格。秦人处于宗周古地,浸润了极浓厚的周文化因素。本书所选录的不其簋、秦公罍皆为秦器,可以感受到其与西周晚期虢季子白盘一脉相承的关系。楚为南方大国,周邻的曾国文字与其同属一系。本书选录的王孙遗者钟、曾侯與编钟文字结体修长,秀美婀娜,颇多装饰意味。逮至战国,流行“物勒工名”式的短铭文。书中选录的中山王大鼎长铭是在这一背景下为数不多的珍品。

金文的发现与研究在古代称为金石学。正如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的序言中说“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可见当时也不乏青铜器出土的例子。见诸史书的有这么几宗。据《汉书·郊祀志》记载,汉武帝时,在汾阴掘出了一个鼎,没有铭文,但有漂亮的纹饰。朝野为之震动,文武大臣认为这是“天祚有德”的一种祥瑞。为此,武帝把年号改为元鼎,并把鼎荐于宗庙,封禅泰山。到西汉晚期宣帝时,在美阳(今陕西武功县)又出土了一个西周铜鼎。又有大臣们说是祥瑞,主张援引武帝的旧例,以鼎荐于宗庙。当时的京兆尹乃是精通古文的张敞,他释读出其铭文为:“王命尸臣,官此柁邑,赐尔旗鸾黼黻琫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他认为器主是周代大臣名为尸臣,不宜将大臣之器荐于天子宗

庙。此外还有孔悝鼎(《礼记·祭统》)、仲山甫鼎(《后汉书·窦宪传》)等。

考古发现中也往往见到晚期墓葬出土早期器物的情况。比如1964年江西南昌老福山发掘的西汉墓葬中就出土有商代的铜器。1953年湖南衡阳苗圃清理的东汉墓葬中也发现有青铜酒器随葬。2015年,轰动全国的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一件凤鸟纹青铜提梁卣,与宝鸡戴家湾、石鼓山出土铜卣风格一致,显然是西周早期之物。当然青铜器这类物品行用的时间比较久远,可能属于祖传之物,但是也不排除这些青铜器属于墓主人的个人收藏的可能。

汉代以后,各地也时有铜器出土。如沈约《宋书·符瑞志》记载了南北朝时期先后十五次出土商周铜器。清儒阮元还将唐代出土青铜器整理成《商周铜器说》(《研经室三集》卷三)一文。宋代,由于朝廷提倡,金石之学大盛,对金文的著录、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

宋代被公认为古代金石学的一个高峰。究其原因,除了唐代以来墨拓技术和印刷术的发达为其提供技术便利而外,从封建帝王到朝廷士大夫皆热衷收藏,从而导致盗墓之风由此而盛。叶梦得在《石林避暑录话》中曾感慨道:“宣和间内府尚古器……而好事者复年寻求,不较重贾,一器有值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竟搜剔山泽,发掘冢墓,无所不至,往往千载之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盗墓之风盛行客观上推动了金石学的大盛,而金石著录之学也客观上存留了当时出土器物的信息。一项新学问兴起的背后竟然是如此肮脏的交易,真可叹也。不得不指出的是,叶梦得所指出现象放置今天又有什么差错呢?眼下逐利之风盛行,收藏类电视节目大行其道。作为考古工作者,每每在盗墓贼之后清理残冢,无不让人扼腕兴叹。

赵宋时金石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北宋的杨元明(南仲)、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和南宋的薛尚功等人。从当时的条件看,水平相当高,有些见解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宋人编著了不少铜器铭文的著录书,据翟耆年《籀史》记载,仅至南宋初年即有三十四种之多,但保存到现在的尚不到三分之一。王国维曾根据保存下来的十一种宋人著作编成《宋代金文著录表》,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所著录的种类、名称和件数。流传到今天的金文著录书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1)兼录器形与铭文。这类书主要有吕大

临编著的《考古图》，该书图像与铭文并重。既摹写铭文，又有器形图形、尺寸、重量、出土地、收藏者，并附考释。其编写体例完善，为后人取法。此外，王黼奉宋徽宗敕编的《宣和博古图录》、赵九成的《续考古图》等也兼录有器形与铭文。(2) 单录铭文。这类书主要有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休的《啸堂集古录》、王复斋的《钟鼎款识》等。(3) 专门考释类。如欧阳修《金石录跋尾》、赵明诚《金石录》等，属于“撮其大要，别为目录，因并载其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之属。

元明两代金石学衰落。清乾嘉以后，金石学和小学复兴，金文的著录、研究又开始达到鼎盛时期。乾隆时，朝廷先后命梁诗正、王杰等人仿《博古图录》体例编成了《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和《乙编》四书。乾嘉之际，由于朴学的兴起以及《西清古鉴》等书的编纂，士大夫中对金文感兴趣的人逐渐增多，清人的金文著录书达三十余种，远超宋人。嘉庆元年，钱坫编成《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专收自己的收藏之器，器形、铭文并录。嘉庆九年，阮元编成《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收各家拓本，加以考释。嗣后还有吴荣光著《筠清馆金文》、吴式芬著《捃古录金文》、吴大澂著《窞斋集古录》、方浚益著《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刘心源著《奇觚室吉金文述》等问世。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金文著录研究的基础上，古文字学逐步脱胎发展起来。如吴大澂在从事金文著录的同时，著有《说文古籀补》等古文字工具书，订正许说之谬，被誉为古文字研究领域划时代的著作。另有《字说》一卷为金文研究之心得，每篇皆有新义。孙诒让有“清代学术殿军”之美誉，极为后人推崇。所著《古籀拾遗》、《古籀余论》、《籀廬述林》等书“声义密合”，嘉惠学林。

民国时期，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逐渐形成，古文字学也逐渐加强了科学性。1931年，罗振玉编成《三代吉金文存》20卷，著录铜器4835件，皆以原拓影印，是一部资料丰富、印刷精良的商周金文著录之巨著，对铜器铭文的收集、传播和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王国维在这一领域的成就主要是在古器物的考订和铭文的训释等方面，其重要著作是《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观堂古金文考释五种》以及收在《观堂集林》中的系列论文，见解独到，发前人所未发，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郭沫若的金文研究也极具典范意义,他借鉴考古学中的类型学方法,根据器物的形制、花纹和铭文的字体、内容等,在标准器断代的基础上对西周王朝的铜器进行了区分所属王世的研究,又对周代诸侯国的铜器(大部分属于东周时代)进行了分国的研究,撰成《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这部名著,建立了铜器铭文研究的新体系。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考古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出土的金文数量远超前代。各种著录林林总总,数量甚多。其中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殷周金文集成》收录1988年之前出土的所有今天拓片,总计11983件,每器之后注明铭文字数、时代、著录、出土、流传、拓本来源及现藏地点等,是商周金文资料的集大成之作。作为该书的补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近年又陆续组织编纂了《近出殷周金文集录》、《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等。

20世纪以来的金文研究名家辈出,成果宏富,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的深度远超前人,取得的成就也最为突出。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罗列。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陈絜《商周金文》一书中的有关论述。

当然,金文的研究发展至今天,已经形成了诸多新的领域。譬如就文字学来讲,有书体的研究、字迹的研究、语法的研究、音韵的研究、通假的研究、字词关系的研究等等。从内容上看,有人探讨其中涉及到的社会制度,如礼乐制度、赐命制度、世族制度等,有专门探讨其中军事铭文的,有专门探讨其中法律铭文的等等。金文的研究正焕发出青春,随着更多的爱好者、研究者投身其中,必将取得更大更好的成绩。

目 录

凡例	(1)
前言	(1)
金文选读	(1)
1. 小臣俞尊	(1)
2. 小子鬲卣	(5)
3. 尹光方鼎	(9)
4. 四祀卣其卣	(13)
5. 妣(匱)丁尊	(18)
6. 利簋	(24)
7. 天亡簋	(30)
8. 豐方鼎	(36)
9. 趯尊	(40)
10. 保卣	(46)
11. 子鼎	(52)
12. 疑尊	(56)
13. 叔矢方鼎	(60)
14. 克壘	(65)
15. 大盂鼎	(69)
16. 矢令方彝	(79)
17. 中甗	(86)

18. 盞驹尊	(90)
19. 柞伯簋	(95)
20. 夔公盃	(100)
21. 班簋	(107)
22. 戎簋	(114)
23. 裘卫盃	(119)
24. 史墙盘	(125)
25. 五年琯生尊	(135)
26. 五年琯生簋、六年琯生簋	(141)
27. 趺簋	(147)
28. 多友鼎	(154)
29. 颂壶	(161)
30. 兮甲盘	(167)
31. 虢季子白盘	(173)
32. 不其簋	(178)
33. 曾伯霁簋	(184)
34. 秦公罇	(189)
35. 王孙遗者钟	(197)
36. 曾侯與钟	(205)
37. 中山王響鼎	(215)
38. 鄂君启节	(228)
参考文献	(239)
后记	(243)

金文选读

1. 小臣俞尊^[1]

【图版】





【释文】

丁子(巳)^[2],王省夔且(祖)^[3],
 王易(赐)小臣觶(俞)夔贝^[4]。
 隹(唯)王来正(征)人方^[5],隹(唯)
 王十祀又五^[6],乡(彤)日^[7]。

【著录】

《中国青铜器全集》4：134；《商周青铜器铭文选》004。

【注释】

[1] 又名小臣觶犀尊。清朝道光年间(一说是咸丰年间)出土于山东寿张县(今梁山县)梁山下,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2] 丁子,子为子女之子,在商周甲骨、金文所见干支纪日法中均假借为巳。而十二地支中“子丑寅卯”之“子”往往写作“𠄎”、“𠄎”、“𠄎”等形,与子女之子写法不同。干支纪日以十天干(甲乙丙丁等)与十二地支(子丑寅卯等)循环相配。始于甲子,终于癸亥,共有六十日,丁巳为第54日。

[3] 省,字作眚,从目,生声,目与生共用一横划。眚、省本为一字,《说文解字》误分为二。省,省察、巡视。《诗·大雅·常武》:“省此徐土。”《南宫鼎》“王令中先省南国”之省字与此用法相同。

夔祖,地名。指夔地宗庙之类的圣所。或释为京或亭,意为夔地之京或亭,从文义来看,此说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京、亭均为高台之建筑,与字形不合。

[4] 易,假借为赐,赏赐意。

小臣,职官名。俞,人名。

这句话的意思是,丁巳这一天,王巡视夔^夔这个地方,赏赐给小臣俞以夔地之贝。

[5] 佳,读作唯或惟,句首语词。

来,归来。“来征人方”即征伐人方归来。殷墟卜辞所载“十祀征人方”卜辞中既有“正人方”,亦有“来正人方”。前者指其往程,后者指其归程。

人方,或称夷方,夷是商人对东、南民族的称呼,人方是位于这一地域的商代方国名,亦见于殷墟卜辞。关于其方位有东方说、西方说、南方说等不同观点。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丰富,通过尝试着将考古遗迹与卜辞地名相联系,东方说愈发可信。

[6] 祀,殷人称年曰祀。《尔雅·释天》:“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不过周初也有称祀者,如大盂鼎“佳王廿又三祀”。

彡,即彤。商代祭名。《书·高宗彤日》:“高宗彤日。”孔传:“祭之明

日又祭，殷曰彤，周曰绎。”孔颖达疏引孙炎曰：“祭之明日寻绎复祭也。彤者，相寻不绝之意。”

【延伸阅读】

1. 小臣俞尊是“梁山七器”之一。所谓“梁山七器”，是说清道光年间（一说咸丰年间），山东寿张县梁山出土了七件青铜器，分别是：小臣觶犀尊、大保簋、大史友鬲、大保方鼎一、大保方鼎二、伯害盃、伯害鼎。这些青铜器器型庄严厚重，纹饰华丽繁缛，是商周青铜器的典型代表，时人誉为“梁山七器”。小臣俞尊出土后曾收藏于曲阜衍圣公府内的孔庙作为礼器，遗憾的是后来流失到海外。

2. 小臣是商周时期对一类人的称呼，卜辞、金文多有。一般认为是职官名，但是其身份变化多端让人难以揣测。经过探讨，多数学者逐步认识到，小臣来源于异族，职司是随侍左右以供奔走的近侍。其地位虽然卑微，但若能获得统治者信任，便可由近侍进而身居要职，甚至入主中枢。最突出的例子即是大家熟知的伊尹，《吕氏春秋·尊师》称他为“汤师”，《叔夷鬲》说：“伊小臣佳辅，咸有九州。”可证《史记·殷本纪》并非浮夸之词。

【进阶篇目】

1. 陈寿(陈公柔、张长寿):《大保簋的复出和大保诸器》，《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收入张长寿著:《商周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

2. 周言:《释“小臣”》，《华夏考古》2000年第3期。

3. 汪宁生:《“小臣”之称谓由来及身份》，《华夏考古》2002年第1期。